

人人都是性变态

孙穷理

——回应臧汝兴〈什么才是真正的激进？〉

我们来玩个「连连看」的游戏。「马克思主义」对上「资本主义结构」。那么和「性解放运动」相连的，就应该是「父权（家庭）结构」了。造成现代国家意识型态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；而造成父权意识型态的则是以「家庭（族）」为中心的生产方式。

我们都生存在多重的结构性压迫之中。我认为，任何一种对结构性压迫的「理论」都不过是随意的「解释」。无论马克思主义或「反父权」的论述，都不具备「真理」的资格（事实上，也没有任何一种「解释」是「科学」——真理的……），它们都是连结「痛苦」与「行动」之间的纽带。

在「破」报第四期，刊出了来自韩国，臧汝兴的〈什么才是真正的激进——从社会生产关系看豪爽女人〉，是从「马克思主义阶级运动」去看「性解放运动」，产生了若干视角上的盲点。其中的一些说法，经常可以在「左

翼前进分子」对「性解放运动」的批判中听到，而现在，我打算从「性解放运动」这边出发，去看看这种说法。

从对抗「父权结构」的角度来看。「性解放运动」不单单是「女性主义」的。它不应该被过于简单地理解为「为（生理上）女性服务的」。这样地「简化」是一种「男性」（父权的）误读（并不是只有男性，才会有「男性的」误读……）。

首先，我并不同意「性解放运动」是对抗「性压抑」的运动。因为，这里已经预设了「无压抑」的「性」。而在结构中，「性」本身即是一种「社会的建构」，并不是属于人「本质的」东西（又有什么东西，是「人本质」的呢？）因此，每一个人，他的「性」（也包括了「性冷感」——这也是一种「性」的模式。）全都是「性压抑」的产物。如果，真的有所谓「性变态」的话，我可以这样说：「人人都是性变态」。因为，他们都是经过「压抑」「变了质的」产物。

以味觉为喻，人的味觉是多元多样的，它有无限的可能性。每个人都会有独特的味觉癖好，而「性」也是一样。有些人用「变态心理学」的角度，

考察同性恋者的「病史」，说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什么因素，什么什么经验，产生了「性压抑」，终于变成了同性恋。这样对不对呢？或许对！可是我要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回到同性恋者的「病史」，去找出他「形成」异性恋的「性压抑」，因为，去除了社会外加的「控制、改造」的过程之后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「性的癖好」的成因。从这里，我们才说：「人人都是性变态」。

「性解放运动」是全面对抗「性道德」的斗争。要去除对「性」的审判。也就是去除「正常／不正常」这一个判断的形式。「人人都是性变态」，再也没有「正常／不正常」这一个判断的形式。「人人都是性变态」，再也没有「正常／不正常」的性了。

如此一来，「性解放」没有「阶级的」差别，它也是「超性别」的（从前，「异性恋」的男人，不是充满「敬意」，就是充满「敌意」，再不然就是「充满了敌意的敬意」地在一旁，「观看」着「性解放运动」，他们以前嘻嘻哈哈「好不正经」地谈论着，现在，这些男人也可以「抓下来」一起搞了）。

臧文，无异是「父权结构」打压「性解放运动」的本文，只不过是用了「左翼、基进」的形式。在根本上，仍是「结构的防卫」，因为「建构主体」对于「反抗结构性力量」的「意识型态上的恐惧」。它的根源，与「卫道士」的「道德」是一样的。

意识型态，不单是为「阶级利益」服务，它更是为「结构的安定」而存在。因此，一个「无产阶级」，他也可以满脑子是「维护资本家利益」的「资本主义意识型态」。而一个「女性」也当然可以满脑子是「父权的意识型态」。（臧汝兴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，他名字里有半个「女」字，搞不好是个女人哟！）

使用理论／理性（无论它是医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法学还是马克思主义）来打压（指导）非理性／欲望，不就是男性中心常见的策略吗？……

我不否认，「父权结构」和「资本主义结构」是紧密地相连着的。这两者都不是对当今世界「完整的」描述。因此，它们都不能「盖括」此世人类所遭受的「结构压迫」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之

时，性别压迫的问题就会消失，就是将「结构压迫」单纯地视为「资本主义结构」的结果，固守这种单一化的解释，使得「性别压迫」的问题，无法从物质基础上思考，因此，相对于「阶级革命」，便被用「先后」问题排除了。我认为，即使这两者之间有复杂的牵连，但仍应该分开来看待，在运动策略上，是相互独立的，没有「先后」的问题，它们有不同「物质基础」与「革命对象」。

在臧文中概述了资本主义形成过程里，「家」和「两性」关系的演变，却关键性地遗漏了它们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情形。难道，没有资本主义，就没有「父权」和「家庭」了吗？而这一个遗漏，使得他将「父权」与「家庭」解读为资本主义的「现象」，这才会认为「性别」的问题，是「表面」的问题。事实上，从人类「有生产方式」以来（人类，是不可能没有生产方式的），父权结构即已在逐渐形成，到了「资本主义」开始之初，它就牢不可破地存在着了。而作为「新的」结构性力量的资本主义，和这个「旧的力量，相结合、转化，才变成了臧汝兴所描述的种种形式。

从这个角度说，在资本主义结构中，因为生产力的需求，解放了女性的

经济地位，这使父权结构（家庭制度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「撼动」，从庄园经济的大家庭，女性全然没有掌握经济上生产力的可能，到今天小家庭，甚至「无家庭」，女性有了掌握生产力的机会，资本主义对于「父权结构」的挑战，可谓「不无功劳」，臧汝兴说，现代家族，已经从「生产单位」，变为「单纯的消费单位」（实在不知何解？）那是根本拒绝从「生产关系」上去理解「家庭」，因此才会有「不知道父权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什么」的说法。如果，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以个人为生产单位的社会，性别分工不再是掌握产力的基础（在这里，根本没有家庭这一个生产单位），那么，「父权结构」的支持力量，还会剩下多少呢？

因此，我认为，「性解放运动」是符合「唯物史观」的。

臧汝兴用死硬的教条解释历史，硬是把「父权」看作资本主义的「现象」，变成了「性控制」如果不在资本主义的脉络中根本无从理解（如果，照他的解释方法，中国妇女的「缠足」、「贞节牌坊」这些东西，都不是「性控制」了）。他在分析男性于父权结构中的「利益」只限于「经济上」的利益。

有三个理由，使他认为「男性劳动者并未因性别差异真正获利」。第一个理由说：「资产阶级用性别歧视稳固其支配基础的结果，劳动阶级的受压迫处境，更加艰难。」至于资产阶级是「如何」用性别歧视来稳固其支配基础呢？那是用他第二和第三个理由的那种方法。因此，是以第二和第三个理由为前提而成立的，没有了第二和第三个理由，第一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，这语言游戏，是硬凑出来的。

现在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理由：他认为因为劳动阶级女性担任家事劳动，使劳动力价值下降（男性劳动阶级因为有人帮他分担了家事劳动，使他的劳动力提升，而薪资没有改变，所以说「劳动力的价值下降」）。以家庭分工来思考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，本身并没有问题，可是他完全忽略了女人也是「人」，她为什么要（在家庭分工中）进行「无偿的」家事劳动，而在社会分工中，进行（相较于男性）「低偿的」劳动呢？男性的劳动价值是「下降」了没错，可是女性呢？他的劳动价值，却根本是「零」（在家事劳动里）。

这就是他忽略了以「家庭」作基本生产单位这一个「生产方式」的结

果，没有「个体」，只有「家」这个「整体」，于是，他可以不顾「男人有收入」、「女人无收入」这一个事实，说「男人没有获利」。「家」已经小到不能再小，只有「家」（男人）的收入，而没有「女人」的收入，所以也用不着比较（真是的，哪有人再说「男人没有获利」的时候，不去和「女人」作比较，而在那里自说自话的啊！）。

第三个理由，更加地是「见树不见林」得莫名其妙。女性投入劳动市场后，因为「工资低廉」所以牵制了男性的工资，可是为什么女性的工资要比较低呢？这就好像说，现在有了机器，所以人工不值钱了一样，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，难道男女「同工不同酬」这件事比它「压低男性工资」这附带效果，更加地「表面」，更加地「不重要」？

「劳动阶级」女性的「经济生产价值」在以家庭为物质基础的「父权结构」沙文观点中，被「一笔勾销」，臧汝兴的说法，可以做为「范本」。它不仅只是一个「不合逻辑」的「怪论」而已。

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力道，在于「物质基础」如何「决定了」「上层建筑」。而不单单只是在「物质基础」中打转，否则，

根本称不上「唯物」。「经济决定论」不去说「经济决定了什么」，那还能称之为「经济决定论」吗？

他所提到的（也许就是他所意识到的）「女性弱势」问题，全部都是「经济上」的问题，因此，我认为，他根本还没有开始意识到「性控制」这个东西，也就还没有「开始」和「性解放运动」对话。

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」是「父权结构」的物质基础，而「异性恋的『正常』男性」，则是这一结构的「既得利益」阶级。从而开展的「上层建筑」包涵了「性道德」（也有「非性的道德」是为它「服务」的，如：孝道）、「爱情观」、「两性关系」、「性别差异」……等等，这些因时代而改变的意识型态，构成了各种态样的「性控制」。性解放运动从对抗这些「性控制」出发，而终究要回到从「物质基础」上的「根本革命」——瓦解「家庭」这一个「猥褻」的（把这个名词还给它的）人类组织（生产方式）上去！

臧汝兴指责何春蕤认为女性的被压迫与「能力」有关，是与「资产阶级训诫劳动者」的说法相同。我认为根本是诬赖，在乱扣帽子。

何春蕤要女性在「性」上面积极、主动、创意、不用赚赔哲学，就是要打破女性「能力」上弱勢的迷障，好像要工人团结起来，掌握「生产工具」一样。女人的身体，就是女人生产欲望与快感的「生产工具」，必须要自己掌握，「男强女弱」与「资本家（能力）强、工人弱」一样，是意识型态的建构。臧竟然可以用何指出的「错误意识」强加于何之上，用她反对的东西，说成是她的东西，这种离谱的误读，恐怕不单单是他没有下功夫理解「性解放运动」而已。

臧汝兴认为「性解放运动」只能「搅乱」父权结构，而不能「打破」它，这一点，我同意，但是，绝不代表我认为「阶级运动」可以打破父权结构，我反而要问：难道「阶级运动」可以「打破」资本主义结构吗？

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无产阶级天堂的神话，可是，到了今天，二十世纪九〇年代，这个神话只有越来越远了，也许臧汝兴还相信它吧！（相信不相信是个人价值，无涉对错问题，它们都是可贵的！）但我认为，结构的问题，只有结构性的力量才能改变，身处其中的人是被决定的，在那些物质基础之前，任何的运动都无能为力！

然而，这种悲观的处境，却不能，也不应该消灭我们运动的能量，反而，我们要在大革命神话消解之后，依赖自我的意志而行动下去。「性解放运动」如此，「阶级运动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

「性解放运动」陷在一个双重的框框里，无法脱出。第一个框框，是阶级的框框。这一点，臧汝兴与其他许多运动者都质疑过，我也要同样地质疑，如前文所说的，它在本质上，并非具有「阶级属性」。「性控制」存在于任何一个阶级之中，绝不是「中产阶级」所专属，而今天，若它真的只能在「中产阶级」中动，则应质疑，是不是「中产阶级」的沙文主义在其中作梗？让无产阶级的男、女脱离家庭的魔掌，消灭已有的、未来的家庭及其意识形态，应是运动的目标（「资产阶级」的女性，就好解放了吗？瞧瞧连方瑀，或是王永庆的三个老婆吧！）。

另一个框框，是性别的框框。「男人」作为既得利益阶级，实在有「动不得也」的困难，这唯有赖于发现「男人」这一个建构，对于每一个男人他具体的欲望、身体，经由「性控制」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每一个「性变态」，当你们被制造成「男人」之后，意味着「可能性」的消失，也许，到

那个时候，才会惊觉，原来「经济地位」的强势，背后竟是一个被「切割」而「异化」——人和「欲望」异化，和「身体」异化的事实。唯有在这里，我们才会发现，男人「实际上并未获利」这件事。

「性解放运动」作为一种「基进」论述，和「阶级运动」应该是并存的，两者之间，不存在「先后」问题，也不能够相互取代，因为相对于「中心」的宰制，向于「边缘」的「逃逸路线」有着无限的可能性……

（1995年12月1日破周刊）